



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

蒋增福

浙江文艺出版社

□ 郁达夫与夫人孙荃、
子龙儿合影
(摄于一九二二年)



□ 郁母陆太夫人像
(摄于一九三六年)

□ 陈碧岑致作者函

(右陈碧岑像)



增福同志：

前在京时曾由郁风转来有关双烈亭事的呈报市委稿件一切措词确实有力为韵田老申心感不已。

昨接市民报知您已迁故里又将为观山设计一切至有意将原有二楼三底旧屋改为解放日报楼上仍照当年捐献收楼上的规定仍放烈士们遗物不作别用但以前这旧书籍傢俱等物是否存在步卜今析当年收楼时所记名件以及血衣塚上碑文照抄一份附上必要时以便查对属事由郁风面呈扶病并此问安附上人民日报增刊一份以备必要时查对之用至颂
顺府安好

胡里同志处均此问候

八八敬

陈碧岑手书

1951.5.25.



□ 作者访问郁达夫表弟戴福年，右为郁达夫孙女郁嘉玲。
戴福年早年曾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摄于一九九一年）

郁风致作者函

(右郁风像)



增福同志。

刚昨日发去一信，忘了说关于

富春江，我已想出一个设计，很简单，用两色，基色是黑色和另一色，

富春江三字及边框用

颜色每期换，画用

黑色单线连累，我

如同去我青青岛期间

画它亦幅富春江风景，每期换一幅

可用半年，以后可由史便荣或其他

同志继续，可用水墨单色画成简

笔小册页。

郁风

听夏衍分灯说读书“近一期各一篇”
海郁达夫文很妙，我尚未读，达夫研究不妨转载



别
张
大
方

何时换？未得局否？

序

一九八五年九月，作家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会暨郁达夫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其故乡富阳隆重举行。

正是那次会议，我认识了本书作者蒋增福同志。会议筹备过程中，他作为富阳县政协的秘书长，和县里其他领导同志以及达夫的长子天民，一道来杭州找我，作过多次商谈；记得那次适夷提前到会，增福和天民从富阳赶到杭州，与我一起去机场候接；会议期间，增福负责搞会务，我见他里外忙个不停，当时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是，他对县上操办郁达夫的事是很热心的，对郁家的许多人相当熟悉。

那次会后不久，富阳召开首届文代会，我应邀前去祝贺，与蒋增福同志有了再一次交往，而这次，他则移位当选上县文联主席。又过了一年，富阳县纪念郁达夫九十诞辰，并成立郁达夫研究学会，我又应邀前去祝贺和讲话，自然，我们又见了面。他以县文联主席的身份兼任郁达夫研究学会的副会长，从此，便在这个题目上更多地忙开了，也更多地来我这里，征询我对开展郁达夫研究工作的意见，其中也包括“郁会”配备专职干部，他要我出面做些工作，要我为会刊《郁达夫研究通讯》题字等。自从天

民病故，想来他为“郁会”开展工作担子更重，费心更多。殊不知，他不光挂职从事会务活动，还自选研究课题，陆陆续续写出“郁达夫家族女性”的系列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我是在研究通讯上见到的。如今，他把介绍郁达夫和郁家女子的系列文章汇编成集，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写信给我，还上门相求，要我为之作序。有了以前这么多的工作交往，我又身为郁达夫研究学会的顾问，想想实在不好推却。

当然，与我这辈人相比，蒋增福同志只能算是晚辈，尽管他已是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与他自身的经历相比，从事文联工作和郁达夫学术研究，也是晚近的事。据说他过去从事党务、行政工作，并非科班出身，虽然也是浙江作协的会员。与许多卓有成效的郁达夫研究工作者相比，他更是起步晚、底子薄，的确有一段距离。但是他的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何况他作为达夫故乡的人，又一直在当地工作，与郁家的后裔、亲友有过较长时间的、较多的交往、接触，占有地利、人和之方便。故本书对郁达夫作品的爱好者，我相信是会有帮助的；对于郁达夫研究工作者来说，亦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这些郁氏家族的女性人物，有的对郁达夫的成长和性格形成颇具影响；有的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有过较多的反映；也有的则以亲属和后裔的角度，记叙了她们对郁达夫的印象和见解……

上面提到的，我在富阳参与的那些活动中，在对待郁达夫的评价问题上，我曾有过多次讲话，阐述我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最集中的，也是比较系统的，要算一九八五

年九月在富阳的那次郁达夫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开场白”。我在那篇“开场白”中讲道：“说来非常惭愧，浙江省文艺界四十年来没有举行过郁达夫纪念会、讨论会。在文艺界的会议上，也很少提到他。这就是对郁达夫评价的不公正和冷淡的表现。我作为本省文艺界老前辈的人，年轻时候通读过他的作品，三十年代工作上有过交往，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但我们的头脑中也有框框，思想上被一些不公正的议论所束缚，现在应该努力纠正过来。”

胡愈之同志是抗战时期在海外和郁达夫共患难的历史见证人。他在北京的纪念会上曾激动地说：“从达夫一生在文艺上的造诣以及他在沦陷时期的言论行动来看，我不能不承认他有他的伟大。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胡愈老是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一九三三年，他和郁达夫因都参加蔡元培、宋庆龄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而相识。抗战初期又在武汉晤面，一同在军委政治部工作。过后，郁达夫和胡愈老相继到新加坡，服务新闻界。新加坡沦陷以后，他们一同过流亡生活，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时常在一起，用不同方式献身于爱国抗日运动，以掩护胡老为首的一批爱国文化人士。共产党员、著名作家王任叔（巴人），曾在海外郁达夫家里充当过一个月的“看

门人”，对郁达夫当时的一切言论、行动知之甚详。他在《纪念郁达夫》一文中说：“郁达夫只要不外出，他每天一定要到胡老家里去一趟。胡老的话，郁达夫言听计从。当郁达夫自己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刻，他第一个考虑的是胡老和他夫人沈兹九的安全，让他们脱离险境。”前文所引胡老对郁达夫的权威性评价，是在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得出来的。他对郁达夫在文学成就上和政治活动上的评价，是符合历史情况，实事求是，正确、公正的。胡老的正确论断，是我们纪念和研究郁达夫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在首都的纪念会上，夏衍同志开门见山地宣布：“应该对郁达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文学方面继承五四文化传统，奋斗一生的精神，作出正确、公正的评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位中国新文学工作者、伟大作家和诗人。”夏衍同志还说过，过去对郁达夫的不公正评价，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与创造社的关系，或者说以后他跟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他到了南洋以后的最后一个时期，亦即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他被迫在日本宪兵队用假名当了一个时期翻译。

这两个问题，应该说早已有结论，事实都在面前，著作都在，知道他情况的许多人都还健在。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文革”前后那个极“左”路线猖獗的时期，这种对他不公正的议论还没有绝迹。在北京和富阳的会议前后，我重读了一些郁达夫研究资料，虽然还说不上是很深入的研究，但也围绕这些问题对郁达夫的生平、文艺方面的贡献等等有所窥见，并且谈了我的看法，以利于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之形成。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创造”的前期刊物，在我青年时期差不多全都读了的。郁达夫的小说真像一颗炸弹，掷向中国的旧社会、旧礼教，震天动地。它使我，也可以说是和我同时代的青年惊醒起来，开始留意和认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埋下以后改革社会的根苗。大概在一九二五年，我初次认识这位久负盛名的大作家。一九三三年，我在鲁迅、茅盾直接领导下，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月刊当编辑。郁达夫是《文学》的编委，聘请编委的信还是鲁迅转交的，我亲眼看到。在以《文学》和《太白》为中心的一群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陈望道、巴金、郑振铎、胡愈之等，都把郁达夫看作自己人和第一流作家。虽然他已不住在上海，而住在杭州。鲁迅在一九三二年推选郁达夫的《二诗人》，在一九三五年又和茅盾一起推选《迟桂花》，编入在日本和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鲁迅、茅盾介绍中国作家的作品到外国去，总不忘记郁达夫。鲁迅和郁达夫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我不说了。鲁迅也曾公开说，对于文学的意见，我和郁达夫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那末，他们之间的一致究竟是什么？鲁迅对原则问题是非常严肃的。一九二七年八月，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一九二八年六月，鲁迅却和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一九三〇年，鲁迅又提名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同年十一月，左联表决开除了郁达夫。鲁迅事后得知，不同意这个决定。难道鲁迅独与郁达夫结为宗派？过去，我对这些事有点知道，但从未考虑过。这次当作一个问题，看了一点材料，才明白了底细。大家知道郁达夫和鲁迅先后都到过北伐根据地的广州。他们在广州并

未晤面。郁达夫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和郭沫若同赴广州的，六月离开广州，十月又到广州，十二月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经过“四一二”事变，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广州，十月三日到上海。十月五日在李小峰的宴会上，鲁迅和郁达夫才又会见。十月六日上午，郁达夫到旅馆看望鲁迅，并请他吃午饭。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载了这事：“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中午，就约他同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他们谈些什么，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看其他的文章。

郁达夫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从广州回到上海，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和《新消息》周刊。他在一月十六日的《洪水》上，发表政论《广州事情》，公开揭露和抨击广州政府的黑暗，指出这一次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甚远”，号召“民众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消灭才对。”郁达夫拥护国共合作，进行北伐，但他在广州已看出问题，提出警告，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内部的争论。二月一日出版的《洪水》上，郁达夫又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指出目前“这工作（指广州根据地和北伐）将走上完成初步的路上去的时候，又有一批新的军阀和资产阶级出来了。”“他们的劣根性就会暴露出来，要压迫大多数的民众了。”“不幸我国革命在未成熟的初期，就暴露了这一种险境。”他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断言：“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若不是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成功的。”就是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必须由无

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完成。二月十二日，郁达夫收到郭老的指责广州事情“倾向太坏”的来信。三月一日，成仿吾在《洪水》上发表《读了广州事情》，批评郁达夫。四月八日的《洪水》，郁达夫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反对独裁者的高压政策。文章说：“处在目下的这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群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敌人，万事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看，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就在郁达夫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的第四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四一二”那天，郁达夫在他《日记》上写道：“东方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午后出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只敢怒不敢言。”四月二十二日《日记》云：“买了一张外国报来看，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关键时刻，这是郁达夫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这不是真正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吗？！

七月三十一日，成仿吾到上海，达夫往访，决定将创造社事务全部交出，“从此脱手”。八月十五日，郁达夫

在《申报》、《民国日报》刊布启事，声明退出创造社。另外，据材料，他发表了这些观点鲜明的文章后，右派很恐慌，用高官来收买他，被他拒绝。他的公开声明脱离创造社，也含有不要牵连创造社的用意。文章俱在，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的内外原因就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看鲁迅当时对时局的见解和对郁达夫的态度。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鲁迅在广州写了《黄花节的杂感》，指出“摘食这果实（指革命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原故。”他已看到革命果实有被夺取的危险，和郁达夫的《广州事情》意见相同。

四月八日，郁达夫在上海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同一天，鲁迅在黄埔军校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指出“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在此之前，郁达夫在《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文学》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未达到以前，无产阶级文学是不会发生的。”

鲁迅在广州发表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大家熟悉的，写于“四一二”改变前两天，比郁达夫在上海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迟两天。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先前中国革命着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肌肉松懈，忘却了进击，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人民对反动派忘却了反击，大难要临头了，再不要忘记进击”。

郁达夫在二月一日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文

学》中，已指出“我国革命中的一种险象”。鲁迅在四月十日，后郁达夫两个月，也在上文中指出了革命存在着的“危机”。

郁达夫和鲁迅，好像在同一个政治纲领指导下写文章。他们在广州根据地，其实时间很短，他们不约而同地预见到“革命中的危险”、“险象”。但鲁迅的文章，是在国民党右派统治下写的，比较隐晦，还不会有杀身之祸；而郁达夫的文章写得比较露骨，容易招祸。因此鲁迅在“四一二”事变后，九月十五日还在广州，曾在两篇文章中，一是《扣语丝感》，二是《怎么写一夜论》中，为郁达夫打掩护。一、是把他露骨的语句磨平一点；二、指出郁达夫平素为人，稳健和气，不至于得罪人，更何况得罪于国。现在，我才看懂鲁迅的话，鲁迅在打掩护，救郁达夫的命。

鲁迅与郁达夫在文学见解上虽有不同，但在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这基本观点上，却很接近。他们的亲密关系，政治与文学上的合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政治思想和艺术认识的相似这一点上的。鲁迅推荐他当左联发起人，不同意开除他，显而易见，鲁迅是根据郁达夫的这种政治基本立场出发的。

郁达夫在文学表现上和为人上，也有不足之处，然而鲁迅在左联会议上说，不要光说郁达夫颓废。郁达夫住在杭州后，被逼与官僚来往，孙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鲁迅，列举事实，向鲁迅控告郁达夫。鲁迅日记上记着这封信，后来发表了，我再查看“日记”，鲁迅对此没有覆信，就是说，他知道了，不表态。鲁迅是看大节的。

一九八五年北京纪念会召开前夕，党中央书记处几位同志指出：郁达夫在一生的关键时候是支持和同情党的。从上述事实分析，在中国革命、国共第一次分裂过程中，证明郁达夫是支持和同情党的。共产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抗日，郁达夫积极拥护，国内外奔走，全心全意为抗日爱国服务，以至以身殉国，再一次证明他是非常支持和同情党的。胡愈之、楼适夷同志，海外共患难的同志都可以证明，他的海外百万言论更是铁证。

一九三七年，郁达夫去日本劝郭老回国抗日，他俩和解了。郭老二次论郁达夫，最后在给《郁达夫诗词抄》作的序言中说：“要在望远镜中看故人”，就是说要从历史地、全面地看郁达夫。刚才我列举的许多同志所提供的事实、第一手资料和观点鲜明的论断，都可以供我们评价和研究郁达夫作指导依据。

趁本书出版和作者要我为之作序的机会，我重提这些情况和观点，也许能对郁达夫研究工作者在研究中有所借鉴和帮助。

黄 源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

杭州葛岭

目 录

序.....	黄 源 1
--------	-------

第一辑

郁达夫祖籍新说.....	3
郁达夫与富春山水.....	17
郁达夫与杭州.....	23
《毁家诗纪》及其他.....	46
松筠别墅小记.....	63
鹤山“双烈亭”小记.....	68
正气永存天地间.....	73
——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侧记	
正直的人永受怀念.....	92
——郁达夫研究会访问新加坡散记	

第二辑

吾生唯盼子孙贤	103
——郁达夫的祖母戴氏	
坚贞的一生	110
——郁达夫的母亲陆氏	
〔附〕 我的祖母	郁黎民 117

高风亮节老弥坚	121
——郁达夫长嫂陈碧岑	
〔附〕 我的母亲	郁 风 135
才女·贤妻·良母	145
——郁达夫原配夫人孙荃	
〔附〕 我的母亲	郁黎民 154
怀念我奶奶——孙荃	郁嘉玲 164
沿着父辈的足迹寻求真理	174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	
郁风的乡情	192
不见归帆自扬帆	200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	
后 记	213